

阅读流行系列



分裂的一代

A GENERATION DIVIDED

〔美〕理伯卡·E.卡拉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流行系列



分裂的一代

[美]理伯卡·E. 卡拉奇 著
覃文珍 蒋 凯 胡元梓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流行系列



分裂的一代

A GENERATION DIVIDED

〔美〕理伯卡·M·卡拉奇 著

覃文珍 蒋凯 胡元梓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裂的一代/[美]理伯卡·E. 卡拉奇著;覃文珍,蒋凯,
胡元梓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
(阅读流行系列)
ISBN 7-80149-575-6

I. 分… II. ①卡… ②覃… ③蒋… ④胡… III. 青
年-问题-研究-美国 IV. D7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6911号

·阅读流行系列·

分裂的一代



著 者:[美]理伯卡·E. 卡拉奇
译 者:覃文珍 蒋 凯 胡元梓
责任编辑:严 波
责任校对:闫晓琦 尤 静
版式设计:辛 诤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厂

成品尺寸:203×150毫米

印 张:21.25

字 数:322千字

版 次: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575-6/B·099 定价:38.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1-3446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我要感谢那些自始至终地帮助我完成这个课题研究和这部书写作的人们。当然，首先我要感谢那些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的那些行动主义者，我要感谢他们的直率和坦诚，感谢他们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我深信，迄今为止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其次，我要感谢那些为本书提供照片的人们。我也要特别感谢 D. 伯莱奇女士与我们进行了许多令人振奋、使人受到启迪的交谈。我也要感谢有幸能拜访的 M. 阿尔迪恩和 J. 戴维两位先生。M. 阿尔迪恩已于 1994 年死于艾滋病，J. 戴维于 1998 年去世了。

许多人运用他们的洞察力，以讨论的方式或以评论的方式为我这个研究项目、这部书稿提供了许多帮助。对此，我要特别感谢 B. 阿尔弗、K. 比里、W. 布雷里斯、C. 卡逊、S. 科乃尔、B. 多姆霍夫、D. 弗莱克斯、K. 吉尔逊、T. 吉特林、W. 高尔登、弗兰克、H. 高尔登曼、B. 哈斯、A. 霍恩斯比、J. 卡拉贝尔、D. 卡雷、P. 里克特曼、M. 马希、D. 麦克亚当、K. 麦克里兰、C. 奥格尔斯比、M. 希夫特、D. 塔卡吉以及 N. 威克勒尔。我也要特别感谢 D. 里斯曼，与他的会谈开阔了我



的眼界。我也要特别感谢 A. 丹尼尔斯，是她丰富了我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并支持我形成了最后的书稿。这部书稿的最后成书，也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 N. 施内德尔和 S. 黑尼曼的支持。此外，E. 格拉德斯通敏锐的眼光和熟练的编辑技术也是本书必不可少的。

支持这个研究项目的机构主要有：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哲学学会、国家人文学科捐助中心以及加州大学。此外我要感谢我的助手：D. 洪特、R. 布尔曼、T. 雷福尔、M. 罗，这里，要特别感谢 J. 伯顿，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为我整理采访磁带。也要感谢 F. 福斯特和 M. 马希，他们为我提供了 SDS 和 YAF 的有关材料。

我还要感谢我进行采访时为我提供房间的人们，他们是：A. 米勒、J. 卡拉贝尔、K. 鲁克尔、D. 卡雷、K. 麦克里兰、T. 吉特林、R. 诺森以及 60 年代以来一直作为我的挚友的 S. 科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庭，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是无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我的丈夫楚克，一直不厌其烦地支持这个项目，为我提供必要的护理、冷静的推理和善意的幽默。我将永远感谢他为这项工作自始至终的耐心、阅读每一份草稿的意志和热情，我也要感谢他烹调的每一份醇香可口的饭菜和其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一项目的主题是“代”，在研究这个主题时，我本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研究期间，我结婚了，生育了两个孩子，并且还面对了两个双亲的辞世。这样，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将我带入时间的概念之中，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开始了为人女向为人母的转变。在有了孩子之后，大多数令人困惑的事情就是代际困惑，正如以孩子的知识不能真正理解我们自己孩提时代的世界一样，作

为父母，我们必须以历史的品格承认，孩子们所生活的世界已不同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所以，最后，我永远感谢我的孩子们，摩里斯和欧里卫，是他们不断地更新了我的观念，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以世俗的方式还是以宗教的方式，我寻找到了代际循环的真理。



引言

当人们谈及 20 世纪“60 年代”时，他们大多会不约而同地把这个时代和民权保护、学生运动、反战、女性运动以及新左翼的兴起联系起来。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与这个时代有关的新右翼的事情。其实，当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加入左翼寻求保护时，也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因受到动员而加入了右翼组织。今天许多保守主义的领导人就来源于“60 年代青年”的这一代，在 60 年代，他们正在大学念书，他们通过加入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简称 YAF）这个右翼组织而投身于政治活动中，这个青年组织设立于威廉·F. 巴克利的庄园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 YAF 创立的同一年（1960），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Democracy Society，简称 SDS）——一个重要的新左翼组织也诞生了。对右翼青年来说，60 年代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反战的年代，也不仅仅是妇女解放、嬉皮士、大麻烟、摇滚乐的时代，正如 YAF 的创立者之一，李·爱德华在回忆中说的：

与绝大多数保守青年一样，对我来说，60 年代



不是约翰·肯尼迪的十年，而是巴里·戈德沃特的十年；不是 SDS 的十年，而是 YAF 的十年；不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十年，而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十年；不是 H. 马卡斯的十年，而是 R. 基尔克的十年；不是 N. 麦勒尔的十年，而是 A. 兰德的十年；不是 L. 约翰逊“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十年，而是 R. 里根“创造性社会”（*Creative Society*）的十年；不是毫无意义的越南内战的十年，而是反共主义纵深发展的十年。对我们来说，60 年代并不是从一种享乐开始，而是从巴里·戈德沃特的《一名保守主义者的良知》一书开始的。

在戈德沃特的竞选活动过程中，在促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参加保守主义运动的过程中，YAF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 60 年代初一位 YAF 行动主义者评论的那样：

我们想创立一个培训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培养能言善辩的、卓有成效的保守主义领导人。不管 SDS 说什么，统治世界的不是孩子而是成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我们关注未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未来五年不会被人们体会到，但是，人们在稍远的将来会感觉得到，并且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他的话很有预见性。许多重要的新右翼的领导人诸如 H. 菲利普斯、R. 韦格里、C. 玛什娜在 60 年代都是 YAF 的重要成员。60 年代成百上千的 YAF 行动主义者

目前已在华盛顿、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工作，有的还在先锋性的保守主义组织和思想库中担任政治顾问或领导人。

这部书力求重塑这些人在 60 年代作为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有的作为左翼行动主义者，有的作为右翼行动主义者跻身于这十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中。从政治谱系的一端到另一端，这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重塑了美国政治。如果说左翼青年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进入了权力中心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这一代人的右翼在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占据了权力的中心位置。由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60 年代不仅培养了左翼的对立面，而且还培养了新一代的右翼领导人。也就是说，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数保守的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不是上一代右翼领导的结果，而是由同一代的左翼引导所致。

然而，我这部书并不是要关注 60 年代的历史，也不是要仅关注 SDS 和 YAF 两个组织。而是要讲述有关这代青年人的左右两翼的故事：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紧张和冲突、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融合乃至他们的命运。以他们所受的早期教育为起点，我跟踪考察了 60 年代 74 位 SDS 和 YAF 行动主义者的生活历程，从他们的政治觉醒到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以及对政治活动的评论等等。经受过激进化的洗礼之后，许多行动主义者的生活较之过去十几年，都面临着戏剧性的变化。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特殊的青年人是怎样涉足政治的？一旦他们成为“政治性”人物，这对他们都发生了些什么呢？这些政治活动又是如何影响他们 60 年代以后（即成年以后）的生活——政治信念、政治评论、职业、工作乃至家庭的呢？

乍一看，这些左翼青年和右翼青年，他们对世界的



看法正好相反，似乎很少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生活故事也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两个群体的行动主义者都非常严肃认真，而且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并严格他们的价值准则，致力于社会变革。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同样的政治激情，这种政治激情又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核心，而这又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同类的根本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 60 年代，一些 YAF 和 SDS 成员找到了他们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契合点，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使部分的左翼和右翼融合到一起。

代的问题

最初萌发了我进行这项研究的是 K. 曼海姆的论文《代的问题》。许多年前，我就阅读了 K. 曼海姆的这篇激发我的研究兴趣的论文。曼海姆认为，同年龄的群体有着同样的历史地位，犹如同样的阶级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一样。用曼海姆的话说，“这种同代性注定了这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人在性格模式上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经历和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不管个人是否认识到他们的共同性，正如阶级与性别代表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一样。那么，是一些什么条件，使这一代人发展出了他们特定的主体意识，从而成为社会变革潜在的特殊力量的呢？

曼海姆提议，应该将“青年”的年龄界定在 17~25 岁之间。这段年龄是人一生中世界观形成的决定性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代人早年对世界的印象被融入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之中，并使这一代人开始面对社会现实，接受共同的命运安排。例如经济萧条期、战争期和其他的社会迅速变革期，都是作为同一代人的共同经历中极

其重要的具体事件，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使他们进入了一个“代内单元”（generation units）。曼海姆同时注意到，当青年人经历同样的历史变革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逐步积累了不同材料，来描述相同的经历。由于社会背景的差异，常常使人们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解释。这样一来，在任何一代人都存在着分离的、甚至敌对的“代内单元”，这些“敌对”的极端性导致了这一代人产生紧张关系；同时，他们的对抗性又是他们进行对话的组成部分，他们共生共存，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而且，作为敌对的“代内单元”，他们又利用彼此来解释他们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对他们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和研究。

在读过这篇论文以后的几年里，在研究右翼女性的过程中，我常常思考曼海姆的思想和观点。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许多 80 年代的右翼女性，考察一下她们的年龄，在 60 年代她们作为左翼和女权主义者属于同一代人。这种巧合，使我再次研究了曼海姆的论文，激起了我对左翼和右翼的青年行动主义者的经历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开始的时候，我想知道，经历了一系列同样的戏剧性的事件之后，人们为什么会以如此根本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些事件？当我阅读 60 年代的有关文献时，我也发现，尽管许多分析家使用了曼海姆的思想来解释 60 年代人，但他们很少注意到“代内冲突”（intragenerational conflict）的理念。

当然，在分析 60 年代人时，研究者必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为什么被动员起来的是 60 年代的年轻人而不是四五十年代作为年轻人的那两代人？用曼海姆的话说，是什么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作为激励中介，造就了这些代内单元？许多分析者由此采用了分析重要的



社会结构变革和社会历史变革等方法来解释这些代内的政治事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 60 年代的年轻人各种主张形成的条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最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生育高峰，这些由生育高峰产生的一代人到 1970 年时，年龄介于 14~24 岁的年轻人达到史无前例的 4000 万，青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有率比 1960 年增加了 52%。这不仅仅是年轻人增多的数字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面临着许许多多不同寻常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例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和第一次参加工作或者结婚前这段时期遇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青少年期延长的问题，埃里克森（Erikson）称这段时期为“社会—心理延期偿还期”：一个不必承担成人的心理压力、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时期。

与此相联系的是，发展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工作证实了曼海姆关于这段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论点，这种创造性一方面表现在知识的增长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经验的增长方面。皮亚杰（Piaget）、科尔伯格（Kohlberg）和埃里克森的研究都表明，青年期是人的一生中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形成了人一生最重要的思维技能、道德信念，解决了人一生中的价值认同危机，为必要的政治认同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除此之外，影响 60 年代青年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方向的发展。里德尔（Ryder）认为，个人按照年龄标准被长时间地纳入学校生活中，隔绝了家庭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从而为一大群的年轻人成为同一个历史实体提供了巨大的认同机会。更重要的是，大学作为思想的中心，对年轻人思考社会政策和政党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活也提供了一种内部特有

的交流方式，也为必要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提供了组织基地。此外，影响 60 年代左翼青年政治主张形成的因素还有：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的传播、核时代的出现以及后物质主义者（post-materialist）的发展。

以上是基于曼海姆的观点来理解 60 年代青年人的主张，但这仅仅聚焦于左翼青年。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同时也对“代内”的另一个“单元”——右翼青年施加着影响。事实上，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都有忽视右翼运动的倾向。现在也很少有学者对右翼和左翼进行比较。我的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描述截然相反的两类行动主义者，追溯这些左翼和右翼行动主义者在时间序列上的政治“事业”和生活“状况”，探索出这些行动主义者意识形态分裂的前因后果及其复杂性，以及他们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的难以预期的政治承诺和政治忠诚。

简言之，一代人决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林特拉（Rintala）指出的那样：“每一代人弹奏出的都不止是一个音调”。要了解 60 年代年轻的保守主义者的重要性以及 80 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右翼领导人，我们有必要知道，60 年代的社会变革是如何把同一代人分化（polarized）成左翼和右翼，从而使得这两翼按照根本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些社会变革的。

相关题目：认同、性别与融合

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题目，力图弄清加入 SDS 和 YAF 的行动主义者之间内在的群体差异。用曼海姆的话说，我想知道，作为政治谱系两个极端中的那些个人，在 60 年代他们是如何经历有关事件的，从而形成了他



们的人生体验？在青年左翼和右翼两个派别中，他们的分界线又是什么呢？除了分析 60 年代的这一代外，这本书也关注相关的三个议题：政治认同的形成、性别的影响、左翼与右翼之间的融合。

政治认同的形成

这本书的根本意图在于对政治认同的探索和研究。在这里，我所讲到的“政治认同”是指，自然的个体或个体身份对作为社会政治因素的个体或身份的确认。在回答“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时，它给我们传递出了“真实的我”这样一个信息。个体身份和个体认同对社会认同是必要的，它被定位为“自我”（self），即通过在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位置，以及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寻求到赞誉和公认，个体获得了一种认同感、一种身份。个体身份的基础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资格，这种身份是其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每一个个体自身包含着多种身份，通过这些身份再和别人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正如洪特（Hount）、本福特（Benford）、斯诺（Snow）指出的那样，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产物。例如，一个人同时可以有多种身份：一位女性、一个成人、一名艺术家、一位慈善家、一位人道主义者和一名民主党党员。但在一个生活阶段，某些身份可能变得比其他身份更加突出，更加显而易见。认同和身份在这里的特殊意义在于，有利于我们理解政治认同和政治身份的社会建构方式，即那种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认同和政治身份的变化机理以及通过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获得政治身份的种种方式。

最近关于社会运动的讨论都高度重视政治认同的重要性。但讨论者经常仅仅用认同和身份来表示与“新社

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相联系的“认同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然而,比起对 SDS 或 YAF 本身的集体认同的建构—组织的意识形态、组织的目标、组织的战术和策略的关注,我更关注政治运动中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很明显,因为个人的政治认同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之间存在着必要的一致性,群体中常能听到的“我们大家”(weness)这一说法就是一种表达这种一致性的例证。要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一名行动主义者,其根本在于,个体认同必须与群体的集体认同融为一体,尽管我们有时也经常看到,个人的认同与群体的认同很少完全一致,两种认同之间的同一性也很少固定化。

这部书研究和分析了个体从政治上建构核心性的自我(a core self)的宏观过程,也可以说是关于个体生活历程中政治社会化的人类学研究。虽然大多数关于社会运动参与的研究都是以社会动员作为研究起点的,本书却以个体童年时期政治意识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开始,这里所描述的人们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见到的一般公民,而是那些从小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们。通过考察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义务的成长轨迹,结合他们的政治行动本身所显示的事实,来定义和描述他们的本质。如这些人的身份是如何变得具有政治性的?政治活动又是如何成为他们的核心身份的一部分的?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同时通过政治活动的场景看到有关行动主义者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身份是如何发展、加强或消解的。这些行动主义者的生活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形成的社会过程。无论是对右翼行动主义者还是对左翼行动主义者来说,他们周围的其他人包括父母亲、家庭其他成员、邻里、社区领导



人、老师以及其他有模范作用的人士都是他们政治兴趣形成和政治信念发展的源泉。

更重要的是，人们一旦认定身份是政治性的，这种信念就会不断加强。伯格（Berger）和拉克曼（Luckman）指出：“身份和认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形成的，一旦形成，它就会维持下去，并通过社会关系得到修正或者重塑”。有关行动主义者的相关事实和经历也证实了类似的观点，行动主义者的同伴和集体活动在他们的政治责任感的巩固和政治信念的重新形成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本书第四章）。他们通过不断的对话、组织会议、印发小册子和文件，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信念。

此外，集体活动还能改变行动主义者的政治信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 60 年代，一系列的事件诸如示威期间野蛮的警察暴力事件，一方面激化了行动主义者，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右翼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左翼人士对运动的政治责任感，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信念。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集体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斯特劳斯（Strauss）写到：

促使这些行动主义者身份和认同改变的一系列事件同样可能降临于同一代、同一职业、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并对其他这些人有着同样的意义，同时也发展着这些人的认同和身份。

60 年代后期，改变了政治认同的右翼自由意志论者和左翼人士，以其对运动的亲身经历和对其运动的理解形成了他们的自我反叛。许多人开始采用“激进的”、“革命性的”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术语来描述相应